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09
14 April 1976

CHINESE

第一九〇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黄华先生	(中国)
<u>理事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达拉特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斯塔格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384 (1975) 号决议所提的报告 (S/12011)。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星期一第一九〇八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全理事会的同意，邀请印度尼西亚、葡萄牙、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印尼代表安瓦尔·萨尼先生和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澳大利亚代表哈里先生和菲律宾代表雷耶斯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提请注意 S/12049 号文件，这份文件载有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我的信，信上要求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由于安理会上次会议对同样要求采取过行动，我想安理会愿意遵循相同的程序。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安理会决定依照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这一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因此，在适当时候，我就会请 S/12049 号文件内提到的人士向安理会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面前的项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印度尼西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阁下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让我们参加安理会审议议程所列项目。在印度尼西亚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期间内，我荣幸地同你共事了两年，所以，也请允许我表示，我深信安理会在你的指导下，对于解决东帝汶问题，一定能够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安理会面前的秘书长报告（S/12011）附有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关于他访问东帝汶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要对秘书长表示高度的赞赏，他不断关心东帝汶问题，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并且继续作出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他尽力执行了秘书长根据第384（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委托给他的任务，该段落如下：

“请秘书长速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东帝汶，实地估量当前的局势和同该领土各方以及有关各国建立接触，以便确保本决议得到执行”。

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在恶劣的状况下，这包括天气方面的，访问了东帝汶。他抵达时正值雨季，而且是近年来雨量最多的一个雨季，大雨滂沱，交通梗塞，成为一件可怕的事。

有人认为，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代表安理会担任的这种任务的报告是不可以期望每个人都感到满意的，我国代表团同意这种看法。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已力实事求是地报告他和那些人会谈，他的活动怎样，报告他所听到的见到的事情，应该把这份报告看作是反映了东帝汶当时的一般情况。在他访问过东帝汶之后过去这两个月，事实上差不多三个月的期间里，领土的情况已有所变化。

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在报告第8段提出的建议，他说：

“……由于有关各方都表示愿意同我的特别代表继续进行协商，我建议目前应继续进行这些协商工作，并将任何发展报告安理会。”（S/12011, 第8段）

当然，印度尼西亚对于如何落实这项建议有它自己的意见。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必须本着领土人民的愿望去寻求解决东帝汶问题的办法。因此，如果安理会接纳秘书长的建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同东帝汶人民进行协商应是他努力的最重要部份，因为在如何执行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剩下这个阶段的工作这个问题上，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决定性的。印度尼西亚当然可以同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在任何他认为有用的时候进行协商，但我想强调，印度尼西亚的意见只适用于行使自决权利这个原则方面，印度尼西亚希望这个原则能和平地、秩序井然地付诸实施，然而，东帝汶人民的意见从头到尾还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国代表团准备把自己这次发言限于讨论秘书长的报告。印度尼西亚对遣送印度尼西亚志愿军回到他们的原居地和对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问题的立场都在报告中反映出来。我国代表团也想谈到东帝汶临时政府就这些重要事项发表的声明。

不过，我要强调，东帝汶临时政府在这个期间已经同意让武装志愿军回到他们的原居地。我不要再次申述印度尼西亚驻留在东帝汶的理由。我在安理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辩论中已详尽地解释了。至于其他事情，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的发言也从人民的观点阐明了该立场，同时还澄清了东帝汶境内的局势发展。我只希望提请理事国注意一项事实，即印度尼西亚留驻东帝汶是根据大多数人民的具体要求，是为了防止他们不过因为希望同印度尼西亚合并而遭东帝汶革命阵线武装分子杀戮。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已经向安理会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那些分子实行大规模屠杀，犯了种种的暴行。

在东帝汶，有组织的战斗已经停止了。现在，东帝汶临时政府控制着该领土。生活正在逐渐回复正常。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支持者绝大多数已经回到他们原来的社区，并宣布他们支持主张同印度尼西亚完全合并的东帝汶临时政府。其实，代表东帝汶临时政府出席安理会这次辩论的就有两名是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重要人。我们也深信，东帝

汶现时的正常气氛将加速已经在帝汶开始的和解程序。行政官署已开始办公；经济建设已着手进行；学校复课了；道路在修筑中；通讯系统恢复了。简单地说，领土正在回复正常。鉴于干部缺乏，印度尼西亚志愿军正在帮助东帝汶临时政府恢复领土正常生活，进行修复和建设的各种努力。

关于要求“撤出”这一点，记住“撤出”在东帝汶人民心理上会发生什么影响这是有帮助的。人们不应忘记，东帝汶人民已经认为自己是印尼人，他们的领土是印度尼西亚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撤出的要求是不公平的；因为为什么要请印尼人离开他们已经认为是印尼领土的地方，特别是领土人民自己想要他们留下来？尽管如此，武装志愿军已从一九七六年二月开始离开该领土。

虽然有组织的战争已经停止，但仍然有小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残余武装分子逃入丘陵。他们的实际人数力量微不足道。他们之中有的挟带人质，扬言如受攻击则杀掉他们。他们杀人，残忍就象野兽，受戮者数以百计，这证明他们不但冷酷无情，而且有本领能实施残暴的屠杀。现在，这些凶恶的罪犯害怕人民报复。但由于这种威胁逐渐中和，东帝汶临时政府和东帝汶人民决定让武装志愿军返回他们的原居地。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已经指出，武装志愿人员正在离开领土，相信撤退短期内就会完成。

关于行使自决权利的问题，印度尼西亚的立场很清楚，并且已经在秘书长报告第43段反映出来。但更加重要的，是东帝汶临时政府的立场。这个立场已经由临时政府的代表传达，由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42段中加以报告，并且在星期一由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向安理会详尽阐述。就东帝汶人民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正式决定通过同印度尼西亚完全合并而取得独立。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印尼人，无异于来自印尼其他地方的印尼人，他们的领土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无异于印尼其他的省分。

我不用提醒安理会印度尼西亚对非殖民化进程的贡献，在坚持自决原则的斗争中的作用，给予世界各地为独立而战斗的真正解放运动的支持。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是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决定性地刺激并加速了各地的独立斗争。印度尼西亚同联合国其他不结盟国家紧密合作，通过第1514(XV)号决议，其后，又参加了二十四国委员会贯彻这项决议的努力。印度尼西亚在这些工作中采取的行动和发挥的作用是如此这样的众所周知，不可能会有人怀疑——甚至很少很细微的——我们剥夺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利。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决权利，印尼人民曾经在整個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发动了一场流血革命战争。印度尼西亚并不意图拒绝他人享有同样的自决权利。我要提醒安理会，印度尼西亚已重复声明，它并没有主张自己享有帝汶的所有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帝汶人民自己主张要求以印度尼西亚为他们的国家。

因为印度尼西亚尊重自决权利，所以它一再声明，虽然印尼人民欢迎东帝汶人民决定同印度尼西亚合并，但我们还是想看看东帝汶人民在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利时是否会随后批准确定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宣告的该项决定。印尼政府也要同印尼国会进行协商，讨论是否接纳东帝汶人民要求合并的决定。

印尼政府还认为，联合国应参加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剩下这个阶段的工作。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东帝汶临时政府决定要求联合国参与这个进程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要建议，联合国的适当机构同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进行协商，商讨联合国在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剩下这个阶段中应该发挥什么的作用。

在此期间，一小撮住在帝汶境外，同东帝汶人民没有联系的东帝汶革命阵线支持分子提出荒天下大谬的主张，大发谬论，疯狂攻击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临时政府——这是那些要隐瞒实情的人的惯用策略。我不愿意深入详细讨论，以致损害安理会的尊严。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听了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的发言。东帝汶临时政

府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来电邀请秘书长派遣他的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再次访问东帝汶，如果安全理事会的愿望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安理会特别注意到，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在他的发言中也邀请了安全理事会和二十四国委员会访问该领土，他说：

“假如联合国、安理会或二十四国委员会想要派遣一个特派团前往领土视察东帝汶的真实情况，临时政府欢迎他们这样做，并且要尽力给予便利，促成其事”。（第一九〇八次会议，英文本第76页）

如果安理会接受临时政府的邀请，无论是请秘书长派遣他的特别代表再次访问东帝汶，或是另派一个联合国特派团，都是最好的办法，最容易找出究竟东帝汶革命阵线提出的主张和控告是基于事实，还是全部都是谎言，由一小撮自命为领导人捏造出来的。他们在领土上发动了悲惨的战斗后离开了东帝汶，从此同东帝汶的人民和发展失掉联络。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或者联合国特派团访问东帝汶，就可以有机会直接认识领土的实际情况和该地人民的愿望。

最后，请允许我简略答复葡萄牙代表在安理会上一次会议所作的发言。

我不打算逐一详细回答他的发言，因为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星期一在安理会作的发言和我发言的前一部分已答辩了各种控告。我们已经说明我们对遣回印度尼西亚志愿军到他们的原居地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已经解释我们对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这个问题的立场。此外，关于二十三名被拘留的葡萄牙人的事件，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在他的发言中已经解释过。

我要通知安理会，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以中间人的身分，给葡萄牙政府使者和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团安排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同时也给被扣留者的家属和代表团安排了会议。这些会议最近在纽约举行。

我本来打算把自己的发言限于讨论秘书长的报告，不同葡萄牙代表，或者就此而言，同任何其他代表团进行任何形式的骂战。我想这样我国代表团就能够对安理会的审议作出积极的贡献。不过，葡萄牙代表迫使我别无他法，唯有以极不愿意的心情，尽量约束自己，起来答辩应战，去满足他。

葡萄牙代表极其能事掩盖他的政府在发生于东帝汶人民身上的悲剧中所犯的丑行，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其实我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在安理会摆出唯我独尊的态度把葡萄牙说成是清白无罪，是殖民主义正派作风的典范，对葡萄牙在帝汶一手搞起的悲惨发展则推在别人身上，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惊愕。

葡萄牙代表似乎忘记了葡萄牙已从帝汶潜逃，推卸了作为管理国应负的责任，虽然他主张葡萄牙仍然具有管理国的地位。但如果葡萄牙仍然自称是管理国，那么它就要负起这个地位固有的责任。它当然不能够避开这些责任，让在它管理之下的领土发生大乱，就这样把责任推卸。如果葡萄牙象现在一样，坚持它具有管理国的地位，那么，同样理由，它也应该因为公然玩忽对东帝汶人民负有的职守责任而受谴责。它不能因为逃走就变成清白。假如葡萄牙履行它作为管理当局而负有的职责，采取防范措施而不是逃走，那么，它现在就不需要谴责所有那些牺牲了帝汶人民的罪行和暴行。我认为，对于在帝汶已经发生的事情葡萄牙仍然要负责任。

葡萄牙代表提醒安理会，他的国家已向国际社会提出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它企图成功完成的艰苦的非殖民化工作中，它是公正的、诚恳的和有决心的。印度尼西亚诚恳地欢迎葡萄牙回心转意，不过，替前葡属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说句公道话，我们认为，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的解放运动对葡萄牙殖民地部队展开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成果与葡萄牙回心转意，不是完全没有关联。其实，葡萄牙之所以回心转意，解放运动的成功可算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对于葡萄牙决定摆脱它的殖民主义历史，感到高兴。因此，印度尼西亚准备同葡萄牙合作，处理帝汶问题。但我们的努力似乎不是葡萄牙所能接受。在较早期间，我们准备派遣船只运载粮食到帝力。但葡萄牙不愿意合作。我们也表示愿意帮助撤走总督莱莫斯·皮雷斯上校。葡萄牙方面有礼貌地婉拒了。但我们继续同葡萄牙保持接触，尝试同他们合作，直至葡萄牙决定断绝外交关系，在安理会控告我们为止。无论如何，我们很想葡萄牙从前管理东帝汶有比较好的成绩。

葡萄牙提醒安理会，说它仍然是东帝汶的管理当局。与此同时，我们在安理会也听到，东帝汶的人民，包括那些支持东帝汶临时政府的和那些仍然追随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都明确地拒绝承认葡萄牙为管理当局。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试图建设性地帮助解决东帝汶问题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现实。

我想重申我国政府的保证，我国一定竭尽全力，尽量同联合国合作，时刻考虑到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和领土的实在情况。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安理会在你英明能干的领导下确实能够按照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对东帝汶非殖民化进程剩下这个阶段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澳大利亚代表。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里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就东帝汶问题发言，感到很高兴，我要向阁下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同你充分合作，在安理会为寻求一项解决目前问题的办法而努力。

我们同样欢迎秘书长和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的报告，我要以我国代表的名义，祝贺温斯皮尔先生根据安理会第384(1975)号决议的规定而执行的工作。他现在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东帝汶局势的认识。

今年二月初，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都在澳大利亚。结果是他们必然了解到澳大利亚的公众深切关注帝汶问题。事实上，自从去年中以来，东帝汶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我国公众深感忧虑。我国政府热切盼望该领土得到和平，它的人民得到进步与繁荣。

特别代表在过去几个星期为了努力确定各方的意见和促进各方讨论意见分歧所必需的情况，费了很大的劲。他的工作可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困难重大，但是他显然竭尽全力不惮烦地按照他的委任的规定，与各方和政府建立了全面的接触。

印尼政府协助了他访问帝力，他从该地到“东帝汶临时政府”管理的帝汶地区访问。温斯皮尔先生在帝力的时候，又有机会和所有决定参加“临时政府”的政党的党员进行讨论。

应他的请求，澳大利亚政府愉快地欢迎温斯皮尔先生到达尔文。他在该地曾企图安排一次到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的地区访问。尽管他在担任这个使命的期间在好几个地方，包括达尔文在内，曾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代表会面，却不能到达帝汶内为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的地区。

这是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事情，虽然有人提出了一些相反的说法，但我国政府是同意向特别代表提供便利，以协助他和帝汶内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建立接触的。

我们并不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特别代表可以当场澄清各方对帝汶前途问题的立场。显然它们对该领土的情况应该如何发展，以及领土的人民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意见等问题仍然存有重大的分歧。但是特别代表却察觉到尽管存有这些分歧，但是还有一些再进一步协商的共同意愿，因此秘书长已经提议应该给特别代表时间继续这些协商。

特别代表也谈到该领土的局势仍在继续演变。这就是说还需要关于当地的发展的情报。特别代表再次访问帝汶在这方面是会有帮助的。从温斯皮尔先生的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东帝汶临时政府”曾邀请特别代表再度访问帝汶，我们欢迎他们所作的保证，就是特别代表可以访问那些他在上一次访问该领土时不能到的地区。

澳大利亚已经清楚地表示了自己对帝汶冲突的立场。它的立场和大会与安全理事会在十二月分通过的决议是一致的。我们支持这两项决议的主要冲击点，特别是决议里面要求外来力量撤出和一个东帝汶人民可以决定自己前途的进程那两点。

我们高兴地看到印尼政府三月二十日在雅加达发表的声明，内中说“临时政府”已经通告印度尼西亚，它不久便会自该领土遣返一部分印尼军队。此外，看来有一些军队已经回到印度尼西亚——我们刚才又听到印度尼西亚代表关于这一点的发言。澳大利亚欢迎这些发展，我们预期这一方面有更好的进展，一些和我们寻求撤出所有外来军队的政策相符的进展。

我上一次在安理会关于东帝汶的发言中，曾强调澳大利亚政府与人民极为了解东帝汶的稳定解决只能由有关人民自由选择来决定。该领土的人民应该自由有效地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而且必须在他们充分认识到可供他们选择的各种变通办法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才算有效，这是澳大利亚政府一贯的坚决政策。但是我国政府并不打算规定任何准确刻板的自决公式或方式。我们宁可依从帝汶人民的意愿，他们认为那一种才是他们真正行使自决权利最好的方法，就照他们的意思。

我们从特别代表的报告中注意到主要的有关各方都同意联合国介入该领土的自决进程。 虽然我们知道联合国在这方面协助的问题仍需分别加以审议和审查，但是我们相信某种形式的联合国参与是适当的，合乎需要的，最能顾全有关各方的权益的。

我们注意到“临时政府”代表的议论和它们对该领土自决的提议。乍看起来这些提议和葡萄牙政府较早时候所宣布的非殖化方案有点关系。 虽然我们认为这些提议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同时也需要确保选举人民议会或国会应该以容许东帝汶人民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进行。

澳大利亚政府继续认为及早恢复对该领土的国际人道援助是重要之举。 这场冲突给当地大多数人民带来了艰难痛苦。 我们对印尼红十字会的工作表示赞赏，这一件工作是其它人，当然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在内，都会高兴参加的。 澳大利亚不但已经向东帝汶本身提供了人道援助，同时也向去年避难逃到印尼属帝汶的帝汶人提供援助。 澳大利亚仍准备再度向东帝汶提供人道援助。

我们希望看到帝汶的痛苦结束，希望鼓励一切以解决帝汶冲突为目的的举动。 虽然自从安理会上次审议这个问题以来，该领土的局势有了演变，但看来仍有一些战斗在进行着。 我们认为，延长特别代表的委任，让他再度访问该领土，从新估量当地局势，并确定各方进行协商的前景展望如何，乃是安理会在目前阶段最好的做法。 让特别代表重新努力，我们也可以希望从中更清楚了解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该领土人民才可以自由有效地表示自己选择了那一种可以决定领土人民前途的方针。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菲律宾代表。 现在请菲律宾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扬戈先生（菲律宾）：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代表菲律宾代表团恭贺阁下当安理会四月份主席，并谢谢你和安理会其它理事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这场重要的辩论。 鉴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我们最近建立的外交关系，看到你主持安理

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愉快。我深信在阁下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的熟练领导之下，安理会必定能够成功地处理面对的问题。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贝宁的博亚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忱，因为他在多事的三月份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身为联合国创办国的菲律宾，自始便一贯地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的神圣权利。自从大会在十五多年以前通过了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和1541(XV)号决议以来，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在全世界执行贯彻这个进程。正是由于我们坚守非殖民化的原则，并希望对帝汶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一点贡献，所以我国代表团才要求参加这场辩论。

我想借此机会重申菲律宾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一如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大会第四委员会就议程项目88“葡管领土问题”进行辩论时，我国代表团已经声明，菲律宾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东帝汶人民行使神圣的自决权利。我国代表团也支持联合国在该领土参与其事，以便断定该地人民是否真的在行使这种权利。最后，菲律宾坚决认为该领土的自决进程必须以符合东帝汶人民所表示的愿望的方法来进行。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帝汶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但应该有助于该区域的稳定、和平和安全、符合帝汶和东南亚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应该坚持宪章的基本原则。

根据上面的看法，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印尼政府对东帝汶问题的立场，一如安瓦尔·萨尼大使和他的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不同的场合所阐明的一样，即：印度尼西亚支持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印尼无意对他们强加任何解决办法，以及印尼希望联合国参与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等。这与印尼多年来作为支持非殖民化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记录是相符的，它积极参与二十四国委员会以及纳米比亚理事会事务，又和我国一道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工作，凡此种种便是反殖功绩的明证。

我们应该适当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是应那些代表大多数东帝汶人民的政党之请

而进入东帝汶的，它是在不能找出一个和平办法来解决该领土的纷争之后才这样做的。安理会必须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和其它区域的国家一样，对东南亚的安全与稳定都是有利害关系而且深为关切的。话虽如此，我国政府对该领土的和平与秩序大部分得到恢复表示欢迎，而且印尼的志愿部队业经东帝汶临时政府同意开始撤出该领土。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注意到东帝汶人民曾通过四个政党——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表示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愿望，而印度尼西亚已经拒绝接受这项要求，除非东帝汶人民本身通过正式的自决行为来表示这种愿望。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的行动证明了它的好意以及与联合国合作的愿望。东帝汶临时政府的成立应该有助于这种民众意志的表现。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秘书长特别代表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拟就，载在文件S/12011号，题为“秘书长遵照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的报告”证实临时政府恢复对人民的各种服务，的确有效能，印度尼西亚为了促进这项工作，已经提供巨额援助。

我国代表团赞赏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以客观的精神执行他的任务，而且懂得天气恶劣，交通梗塞，因此他遇到各种困难。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所有有关各方都同意必须就东帝汶的未来政治地位与当地人民进行协商。目前的分歧，显然是关于应该以何种方法来决定人民的意志愿望。温斯皮尔·圭奇阿尔迪先生在其报告中曾指出“大家都认为应该与东帝汶人民协商有关该领土的未来地位”(S/12011, 附件, 第44段)。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行使自决的方式应该把考虑到人民的意愿，特别应该注意该领土现有的社会文化组织。政治家的风度和耐心的谈判对于达到一个大家同意的解决办法，可以大有裨益。

我国代表团赞赏的注意到临时政府采取行动，邀请安理会或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派遣访问团调查岛上的情况。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团团长吉列尔梅·玛丽亚·贡萨尔维斯先生四月十二日星期一在安理会发言，重申了这一项邀请。这是东帝汶临时政府愿意让国际社会详细检查自己的行动和决定的另一项明证。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的理事国应该注意到当大会在辩论和表决成为第3485(XXX)号决议的决议草案时,国际社会本身也认识到东帝汶局势性质非常。投票的结果是72票赞成、10票反对,47票弃权,这就显示出很多国家认为决议的规定并不完全适当针对该领土的现存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随后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十二月投票赞成决议的许多国家所表示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而非殖民化的程序正在以极适合东帝汶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方式进行中。

菲律宾关怀东帝汶问题,除了同属一个地理区域,同受殖民统治的历史两个理由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菲律宾人民和政府对邻国人民的未来发展和进步怀有最衷心的祝愿。我们热切地希望帝汶人民能够开创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政治前途,并在没有要不得的外来干涉、压力或影响之下,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前途。这样的发展过程完全符合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

我国政府坚决重申,支持一九五五年印尼为东道国的历史性的万隆亚非会议的原则。大家都记得,在那一次会议上,第三世界正在兴起的新近独立国家发表了不少训戒,这些训戒都要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不干涉别国事务宣言是这些构想之一,其中蕴含接受在解决基本上是区域性质的问题时应该考虑到区域利益的概念。整个国际社会接受了这项原则,从而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大大地便利了联合国本身的工作。

菲律宾以这些考虑为基础仔细地观察了印度尼西亚在帝汶局势发展期间的行为。我国政府毫无疑问地认为,在整个过程中,印度尼西亚的行动都是以严格尊重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和国际社会的意见为动机的。印度尼西亚以客观的态度执行自己的职责,它这样做对于解决东帝汶问题和促进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而菲律宾对于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是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考虑东帝汶临时政府代表团团长的好意——即邀请安理会或非殖民化问题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派员访问东帝汶,以便对当地的情况进行确实评价。我国代表团认识到东帝汶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全心全意地支持这项提议。

主席：大家还记得，安全理事会第一九〇八次会议同意，按照 S/12047 号文件内提出的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肯·费赖伊先生发出邀请。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就是费赖伊先生，因此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向安理会发言。

费赖伊先生：主席先生，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承蒙诸位允许，让我就东帝汶人民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向安理会发言，我十分感谢。我是应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从澳大利亚来到纽约的，但是，我却以独立观察员的身分向安理会叙述我的看法，我非常关怀地注视帝汶事件的发展，同时，我必须指出，我为这个事件感到非常悲痛。

为了寻求帝汶事件的真相——我必须强调，路途遥远，真相难明，我和我澳大利亚国会的一些同事在一九七五年曾两度访问东帝汶：第一次是在三月，当时正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两党联合的时期；第二次是在九月中，当时，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帝汶民盟八月政变失败后已经牢固控制着该领土。

虽然我的看法只代表一个独立观察员的意见，但是，我向安理会理事国保证，我的国会同事，大概有五十多名，他们的看法跟我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上星期刚签署了一份送给联合国的请愿书，要求印度尼西亚的部队早日撤出东帝汶。签署这份请愿书的人大部分都是目前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澳大利亚劳工党的党员，但是，联合组成政府的两个政党也有几个党员签署了这份请愿书。

我敢说，我的意见同澳大利亚很多支持东帝汶独立事业的公民和组织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它们包括在澳大利亚境内专门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组织以及教会和海外援助组织。它包括澳大利亚教会理事会和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这两个组织已经向联合国表示它们支持东帝汶的独立；我可以向理事国保证，帝汶独立运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民的支持。

我认为，这种赤裸裸的、公然的背弃正义显失公平的行为，使帝汶人民长期以来身受其害，这种行为出于一系列错觉，错误的判断以及错误无理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是印度尼西亚和其它国家对在东帝汶崛起的各个政党的相对实力的错觉，也是对人民的反侵略、争独立的决心的错觉。

我所说的错误的判断指的是帝汶民盟发动政变的那个决定，我认为，这个政变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鲁莽怂恿下发生的；印度尼西亚一直坚持，硬要把东帝汶革命阵线说成一个可憎恶的共产主义怪物，这就说明它错误无理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要清楚知道在东帝汶的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但是，拿人口总数来做比例，伤亡人数无疑的是非常重大，我们必需把东帝汶的冲突看成是近代非殖民化历史上一个最恶劣肮脏、最悲惨、最不能辩护的事件。

我在一九七五年三月第一次访问东帝汶时，葡萄牙当局仍然牢固地控制着该地区，《武装部队运动》的官员正小心翼翼地扶植各个政党，让它们有秩序的发展，为走向独立作好部署。我们到达当地后，曾邀请所有政党和我们公开的单独的会面，以便讨论它们的目标和抱负。我们只得到三个政党的响应，我相信，它们是当时和现在唯一三个获得帝汶社区真正支持的政党。

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中同帝汶民协会谈，出席人数大约 50 人。我们的第二次会议是在帝力的一个礼堂和帝汶民盟的官员会谈，出席人数大约 150 人；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同东帝汶革命阵线举行的，出席人数估计为 4,000 人。出席帝力各个会议的人数给我们说明了各个政党所得到的支持，我们访问团的不同成员曾坐直升机访问了一些区域中心，在这些中心举行的集会大致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会议结束后，我们的成员都一致认为，乐观的估计，帝汶民协最多只得到约百分之五的支持，帝汶民盟得到百分之十或十五的支持，而东帝汶革命阵线则至

少得到百分之八十的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在帝力所看到的事实。

我们也同意，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所得到的支持，虽然比较少，但代表了有势力的少数——产权所有人、商界和高级行政人员，这些人为了维护其既得权益，当然不愿放弃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

那个时候，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组成了联合阵线，因为双方都主张独立，它们只是对什么时候独立和日后同葡萄牙保持何种关系这两点，意见分歧。联合阵线的破裂终于导致了内战。

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革命阵线清楚明白表示敌意；帝汶民盟的领导人在访问雅加达之后不久就有联合阵线破裂、帝汶民盟流产政变的事发生；这些事实使一般人不得不作这样的假设：印度尼西亚对于这个发动政变的鲁莽决定要负大部分责任。我们在第二次访问时见到被监禁在帝力医院的帝汶民盟领导人，他们的话证实了这个假设。

我们在第一次访问东帝汶时曾特地想找些证据来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指控，即：东帝汶革命阵线事实上是一个共产党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在其后的战斗中，东帝汶革命阵线除了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外，并没有从其它国家得到任何支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些指控是荒谬的。

我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和两位国会的同事再度访问帝汶。当时，帝汶民盟的流产政变刚发生后不久，东帝汶革命阵线已控制了整个地区。我知道安理会理事可能已经看过我们有关这次访问的报告。我只要扼要复述一下。我们乘坐一架租来的飞机，探访了四个我们自己选择的、相隔很远的中心，并巡视了被拘留在帝力、包考和维克克的囚犯。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在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完全控制下的，而且没有半点迹象证明冲突在继续发生。我们完全相信一九七五年九月中东帝汶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内战。唯一的冲突是在巴图加德附近和从西帝汶出动的部队在边界发生过小冲突。

我们发现东帝汶革命阵线是负责任的、温和稳健的，它显然得到东帝汶人民的大力支持。囚犯受到良好的照料管理，值得指出的是，囚犯中包括一些因破坏纪律被捕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支持者。我们同行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党员时常向大众集会以及革命阵线的部队告诫，申明守纪律的必要，他说：“独立事大，报复事小”。

东帝汶革命阵线当局尽管面对着严重的供给和经济问题，但是秩序已经恢复，人民已重返家园，搞耕耘稼穡。内战已经结束，印度尼西亚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为了恢复秩序而进行干涉。象在这段期间内探访过葡属帝汶的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我离开这个地方时，对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们为了处理这个非常困难的局势而表现出的稳健、正直和才智使我大受感动。

我要简单地谈一下关于伤亡人数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根据我在九月份探访中的调查和观察，我相信在内战的两个阶段，帝力死亡人数约400名，其它地区可能达1,500名。即使在这个时候，国际红十字会和东帝汶其他援助人员已经知道有集体埋葬坟墓的存在。这些坟墓相信埋有冲突双方的受害者。印度尼西亚最近报导了关于最新坟墓的消息，但是，没有半点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究竟是死于印度尼西亚军队之手还是给东帝汶革命阵线军队打死的。关于很多人也许已经看过的临时政府发的小册子，应该指出的是，一些列入被杀或失踪名单的受害者据报仍然活着，许多名字据说拼错了，我认为，这本小册子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

洛佩斯·达·克鲁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大约50,000至60,000人死于战争，他说：“现在暴行经常发生，作为对东帝汶革命阵线残酷行为的报复”。以后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报导说，这50,000至60,000人当中有40,000人是难民，但是，在这段新闻报导后不久，洛佩斯·达·克鲁斯又旧调重弹，说什么东帝汶革命阵线杀了50,000至60,000人，对于那些难民却绝口不提。

一些来自雅加达的新闻报导说，由于在战场上犯了太多的暴行，印度尼西亚陆军的一些特别部队已经从东帝汶撤退。

我要简单地谈一下西德尔先生的发言。我去东帝汶的时候没见过西德尔先生，但我有几位同事见过他。在那个阶段，他极力反对印度尼西亚的权益，反对印尼关注东帝汶的情况。我的同事说，西德尔先生从来就没有使他们觉得他是一位可靠或令人满意的证人。他在被软禁的孤立情况下，当然跟不上事态的发展，或作出判断。看来，这个人为了维护其既得的权益是要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目标的，我相信，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尼西亚新闻机构供给他的资料而已。

在一场有限度的战争中，双方面无疑的都不免有暴行，但是，在考虑伤亡人数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个流血事件是帝汶民盟而不是东帝汶革命阵线首先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未掌握全部控制权并执行严格的纪律以前，报复行为总是免不了的。在印度尼西亚入侵以后，东帝汶革命阵线如果不分皂白，任意滥杀，那便是毫无意义；面对着比他们强大百倍的印度尼西亚部队，他们需要得到普通人的好意和支持，才能够生存。

我想要提起，我把一部有关在麻里窝附近冲突的影片带到纽约。这一部影片是由一队澳大利亚电视新闻工作人员拍制的，他们拍完了这部影片以后不久就全体遇害。安理会认为适合时可以拿来看看。

从我两次探访的观察所得，我认为有五点最为重要。

第一，我相信，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群众支持的力量产生了严重的错觉。我们对于绝大多数东帝汶人民的强烈的独立愿望也产生了错觉。

第二，我相信，这种错觉使印度尼西亚、帝汶民盟、帝汶民协和可能其它国家在确定它们对这场冲突的态度上得出了非常错误的判断。

第三，这场内战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怂恿下由帝汶民盟和一些帝汶民协支持者首先发动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并没有发动内战。

第四，一九七五年九月中以后，内战已经平息，当时，印度尼西亚部队却开始侵略边界的地区。

最后，东帝汶临时政府并不代表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它只代表少数人，这些人关心的是怎样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权益而不是大多数帝汶人民的长期利益。

过去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更加关心的是东帝汶的前途。如果印度尼西亚军队撤走，让目前的临时政府统治的话，我确信会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个政府不代表东帝汶人民。

我希望安理会考虑建立另一个由三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参加的政府，以便实施真正的自决行为，然后在适当时举行民主选举。

我非常强烈地相信，假如印度尼西亚不干涉，那么在联合国主持下，各个集团会有和解的余地。

我不能代表澳大利亚政府讲话，但是我相信，如果联合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局面，澳大利亚就会非常迅速地提供大量的援助，帮助我们的邻国走上复原和安定发展的道路。

我以一个平民的身分来到安理会，希望即使在这样晚的阶段，安理会各位理事看到东帝汶事件极其不正义的本质，希望他们不要袖手旁观，不要眼看一个差不多完全没有防御的小国被一个没有理性、误入歧途、侵略成性的邻国残酷蛮横地压垮，坐视不救。

我呼吁印度尼西亚撤退它的部队，回想一下它自己早期为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正义真有帮助战胜强权的话，我以万二分的诚意呼吁你们鼓起勇气，务使东帝汶人民的正义得到伸张，就在我现在讲话的时候，东帝汶人民为了他们的独立和民族解放，正在奋勇作战，为国捐躯。

主席：发言人名单的下一位是贡萨尔维斯先生。我要通知安理会，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贡萨尔维斯先生发出邀请。因此，如果安理会

理事没有人反对，我就请贡萨尔维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再度发言。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吉列尔梅·贡萨尔维斯先生：由于我今天实在不太舒服我的英文也讲不好，但为了行使答辩权，我请我的同事，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马利奥·维埃加斯·卡拉斯卡拉奥先生向安理会理事国宣读我的发言。

霍特先生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曾就东帝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荒诞不经，狂妄放肆的指控。这些指控大部分是荒谬的，不值得一驳，但是我国代表团不想因为我们对这些事保持缄默遂使人误以为我们同意霍特先生的论点。所以，我要对他提出的某几项指控进行答复。

霍特先生一开始就指责志愿人员进行化学生物战，把凝固汽油弹投到各村庄，把生物弹投到劳斯巴拉地区。

众所周知，只有那些大国才有财力大量投资来生产化学和生物武器。因此，指控印度尼西亚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使用过这类武器是荒谬的。

至于东帝汶的局势，我愿意在这里说，假如安理会认为有必要派一名专家去判定霍特先生指控的真伪，临时政府一定充分合作，但是大家要有了解，霍特先生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说明这些武器曾经在哪里使用。我知道这位专家定能探测出使用凝固汽油弹和生物化学武器后所留下来的痕迹。

霍特先生也指控说：

“印尼的封锁使得任何医药援助、粮食和其他人道主义的援助都到达不了我们的人民手里”。

就印度尼西亚的行动来讲，我们只能说，东帝汶人民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人民应我们的请求给予我们援助。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一个外国政府，印度尼西亚政府，给予难民和东帝汶革命阵线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以人道主义的援助，包括提供医

药人员和医药供应品、粮食和其它必需品。目前，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志愿人员正在东帝汶积极地努力工作。医生、护士、教员都来了，各种技术人员也来了，他们修筑桥梁、公路、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机场，帮助促进城乡的发展，建设低廉的房屋和学校，诸如此类的工作，——他们都是被派来的。

由于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特征——完全缺乏教育，没有技术人员，他们的现身到场变成很需要，在葡萄牙统治下，连维持食水供应的人员都要从葡萄牙请来。

往日东帝汶革命阵线当权，他们偶然一次或两次得到澳大利亚的药品供应。他们把一部分至少值2,000美元的药品以200美元的价钱卖给在包考一个名叫做冯云飞的中国商人。

谈到在东帝汶发现的集体埋葬坟墓地时，霍特先生说：

“他们杀死了几百个人，把尸体投入集体埋葬坟墓，然后把这个情景拍成电影，说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犯下的暴行”

我国代表团已经把这部影片和其它有关集体埋葬坟墓的图片交给秘书处，作为安理会的文件。我希望安理会理事花很短的时间——只要六分钟——看一下这部影片，自己确定霍特先生指控的真伪。

很不幸，霍特先生觉得，他在发言中必需诽谤我们临时政府的首长，阿纳尔多·阿劳若先生。帝汶每一个人人都知道，阿纳尔多·阿劳若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象亚洲其它地区的领导人一样，没有和同盟国合作，一起反对日本。当时，殖民地人民把日本看成是他们反对欧洲压迫者的解放军和盟友。

霍特先生过去的历史根本不能和阿劳若先生相比，因为霍特先生自己就是葡萄牙秘密警察收买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的活动，使不少争取自由、摆脱殖民统治的帝汶人民身陷囹圄。

在帝力受到攻击时，看守阿纳尔多·阿劳若先生的人正在企图秘密把他移离

帝力，解往拘禁其它人质的地方，阿劳若先生就借这个机会，在联军攻击首都的一片混乱声中，死里逃生，逃出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魔掌。假如他逃脱不成的话，他就会象他的儿子和其它不幸的同胞一样，落得被东帝汶革命阵线屠杀的下场。

依然列在失踪人名单里面的，确实有拉莫斯·霍特先生的兄弟，阿塞尼奥·霍特的名字。我很容易理解霍特先生对他兄弟的关怀，但是，他不必撒谎，掩盖他兄弟的活动。阿塞尼奥·霍特是联军的现役作战人员，在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多次交战中，他英勇奋战。他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在毛巴拉被东帝汶革命阵线俘获，关进帝力的监狱。在联军解放首都以前，东帝汶革命阵线曾将许多囚犯从帝力秘密移往乡村，他便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临时政府仍然不能断定这个年青人的生死。我们深切关怀的是，他可能是其中一个被东帝汶革命阵线屠杀的爱国志士。

东帝汶革命阵线必定有一个常设的行刑队或者杀人队。临时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队伍。在我们的部落社会里，长者和妇女传统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对此感到自豪。因此，为了减轻安理会的麻烦，我实在没有必要回答霍特先生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含沙射影谬论。

为了使安理会产生误解，霍特先生又一次说，东帝汶内战，结果60,000人死亡。临时政府在给安理会的信中（S/12041）曾作了以下的澄清：

“正如洛佩斯·德克鲁斯先生所说的，在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爆发敌对行为后六个月内战期间的六万名受害者，是受害者的总数，其中包括逃脱东帝汶革命阵线残暴迫害的难民四万多名。这些事实都是在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帝力和东帝汶其他地方实行高压统治时发生的。”

内战初期，东帝汶革命阵线占上风，它对其敌手实行无情的追击，外间观察家估计，当时有3,000人死亡，遭受非致命的伤害者数以万计。

昨天，霍特先生在发言中声称，他的党仍然控制着百分之八十多的领土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东帝汶人民。霍特先生显然喜欢庞大的数字，但是他不应该侮辱安理会理事国的智能。就算临时政府只控制帝力、包考、劳史巴拉、维克克、文埠、阿塔巴、麻里阿那、利卡伊萨，埃姆尔拉、三米、勿地诺、艾纳卢和爱里奥，它就至

少控制 200,000 人，约占领土人口的百分之三十。霍特先生连一个可以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安然着陆，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联络的地点都说不出来，试问，霍特先生怎能说有百分之八十的领土在其控制之下呢？

霍特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就离开了帝力，他显然缺乏有关东帝汶现况的资料。目前，只有一小撮不顾一切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残余仍然留在我国偏僻的地区。霍特先生应该觉醒了。由于这些积极的发展，局势逐渐恢复正常，印度尼西亚的志愿人员于今年二月已开始撤回家园，三月回去的人更多。预料武装志愿部队的撤退将于短期内完成。

讲到这里，我想评论葡萄牙代表的话。他提出几点，其中有一点提到，四个代表大多数东帝汶人民的政党——帝盟民盟、帝盟民协、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和临时政府都没有权请求印度尼西亚援助。这位代表再次自命为法官，一手决定那个有权、那个无权。

葡萄牙代表的话的确伤了我的感情，侮辱了我作为帝汶人民的尊严，他说：

“对帝汶，这块我们仍然是管理国的领土，葡萄牙没有政治、战略或经济利益。此外，葡萄牙已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证明，它对非殖民化困难工作的无私、真诚和决心，我们力图成功地完成这项工作。”

(第一九〇八次会议，英文本第 48 页)

这种发言显然说明了目前葡萄牙政府的态度是多么的奸诈，多么的天真幼稚。如果葡萄牙在东帝汶真的没有任何政治、战略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葡萄牙怎样可能在葡萄牙逗留达 500 年之久，尽量剥削东帝汶人民呢。如果葡萄牙真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为什么要以武器和军火支持这个只代表一小部分东帝汶人民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呢？正是由于葡萄牙的所谓大公无私，使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遭受东帝汶革命阵线恐怖主义者杀戮。

除了东帝汶人民是他从前的奴隶这一点关系之外，他有什么权就他们的命运和前途讲话呢？

让我告诉这位来自里斯本的代表：我们东帝汶人民热爱葡萄牙人民，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但是，请你不要再教我们分清那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东帝汶人民之所以有今天，是葡萄牙殖民主义制度造成的。假如葡萄牙人过去教我们别的东西，我们今天肯定不会坐在这个会议厅。

我在首次发言中向安理会说明了有关东帝汶的事实、发展和当前局势。我解释了临时政府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也把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神圣愿望向安理会理事说了。我谈到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法律与秩序方面的积极发展，而复原重建的工作也在进行。

我曾经提请安理会注意，武装志愿部队已返回他们原来的地方。这是上述发展的延续，也是我们尊重联合国的象征。我甚至提到临时政府已进行筹备的工作，以便利东帝汶日后政治地位的决定。我也建议安理会审慎地考虑东帝汶传统的价值系统，作为贯彻行使自决权利的一个模式。最后但不是不重要，我已指出，临时政府就安理会遣派特别代表进行第二次访问的建议提出了积极的答复，要是安理会要他进行这个访问的话。

同时，我要再说一遍，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或二十四国委员会愿意派访问团到该领土视察东帝汶真正的局势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临时政府将尽力而为，使访问团的访问取得成功。

让太阳的光辉再次照耀东帝汶。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雷克斯·西德尔先生。大家还记得，安全理事会在这次会议开始时，同意按照 S/12049 号文件内提出的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雷克斯·西德尔先生发出邀请。因此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向安理会发言。

西德尔先生：承蒙理事会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给予我机会向你提供有关东帝汶最近局势的额外情报，我谨为此向你道谢。我除了以前同东帝汶有过三十年以上的连系之外，在过去三年，我曾以正式葡萄牙居留权的名义在该领土居住，直到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因需要紧急治疗而被撤走为止。因此，我将向你提供的情报还只不过是关于六个星期前的情况。

在我还未宣读我的声明之前，我想明白地告诉你，作为对该领土最近发展情况的独立的目击者，我到这里来是出于自愿的。我的妻子也伙同我前来，她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们两人的费用都是分别由我们两家支付的。我已经是一个退休了的人，这次决心出来澄清一些有关该领土的发展情况，是为了协助这些不幸的人们取得国际方面的援助。尽管某些国际报业和电台为了取得访问我们的专有权曾出价极高，我们还是决心不靠别人的灾难发财，决定同时向联合国、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作出报告。本来与我是同一国籍的弗赖伊先生所讲的一切显然是基于推测或假定，因为他从去年九月以后便不再在帝汶了。他从这类臆测得出的结论同我自己对该领土情况的观察是有出入的。

我愿意宣读我这篇不带任何成见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在澳大利亚有关法律当局面前宣誓签字的，因为我生来是澳大利亚公民。该声明如下：

早在三十年以前，我同帝汶便发生初次接触。一九六八年，应葡萄牙政府的邀请，我开始每月到帝汶访问一次，每次大约停留一星期，为的是该殖民地的各种商业利益。最后，在一九七三年，我在该岛东端的洛斯·帕罗斯区的杜杜阿拉的一个面积十公顷的种植园定居下来，我在这个殖民地的其他各处的产业总面积是二百公顷。我同我的妻子珍妮一起住在那里三年，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中至十二月七

日，我们的行动愈来愈受到限制，并且自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被印度尼西亚的志愿部队救出来为止，一直被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严密软禁。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名武装卫兵看守着我们的房子。二个半月里，我们唯一的访客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员，他们来听澳大利亚电台早、午、晚的新闻转播，我曾用葡萄牙语配塔当地的法罗柯方言忠实地给他们翻译，因为他们听不懂英语。我我在该领土各地的经历使我对帝汶人日常生活的一般社会和经济状况相当熟悉。

对于那些对该领土的状况不熟悉的人，应当强调葡萄牙人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步骤去发展这一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例如主要的出口产品——檀香木——供应断绝了，该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发展进一步的工业，尽管帝汶的品质优良的咖啡大有发展为出口产品的可能，正如硬木业、椰干和贝壳一样。从领土统治者的观点看来，它几百年来唯一的用途就是一个充军地。因此，它成为放逐许多不受欢迎的葡萄牙平民和军人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当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改善东帝汶人民的命运。

这个故意忽视的政策对帝汶人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后果。在殖民政权的统治下，人民大众根本得不到医药治疗。整个领土只有两名私人医生和一名牙医为六十五万人看病。其他的医疗人员只为军事人员服务。婴儿的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四十五。大部分人严重的缺乏营养，特别是缺乏蛋白质，因此患上了嗜眠症，这使他们很容易染上若干严重的地方性疾病，他们对这些疾病不加控制，任它们猖獗地蔓延着。比方，在那里从来便没有实施过控制疟疾的方案。每年因疟疾、伤寒和结核病而死亡者数以千计。我们在杜杜阿拉的最后六个月里，我的妻子和我协助埋葬因疾病、营养不良和其他自然原因而死亡者达四百人以上。

教育情况同医疗情况一般糟糕。实际上文盲占了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由于没有混合方言，每个行政区内所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言，由于缺乏学校，没有强迫教育，而操洋泾滨葡语的教师们所受的“3 R”师资训练不外是不到十年前在乡区开设的四十日训练班，因此，难怪绝大部分人只会从一数到十或者只会签写自己的姓名而已。

东帝汶人的教育成就反映出这一可悲的情况。该领土从未造就过一名专业人员，这同印度尼西亚的西帝汶形成了强热的对比，那里造就了不少医生、律师和外交人员。在东帝汶，当地人可以获得的最高教育等级是两年中学程度的学习后所得到的职业学校文凭。

这一切对帝汶和帝汶人民产生了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该领土和它的人民一直处于十分原始和与世隔绝的状态。比方，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由于缺少了必要的训练，当地官员大都是无能的，行政系统只能说是发展不完全，并且是贪污成风。由于殖民政府在过去两年完全没有给它的官员发薪（尽管他们每年向年龄十八至六十岁的男丁继续抽二百三十埃斯库多——折合澳币七元左右——的人头税），这使贪污的情形更为严重。举一个普遍的行政上无能的例子，我们的地方警长做了二十年以上还不懂得如何在区内进行一次直接的人口调查。

传统的部落系统仍然是人民生活中的最主要的影响。他们十分依靠权威人物，通常是部落的酋长或者小酋长，为他们作出基本的决定。但即使这些人对于那些不寻常或者重要的问题也是难于作出决定的。这些问题通常必需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进行冗长的讨论和谈判。比方关于从他们中间选出五名酋长作为立法行政理事会成员一事便需要整整一年的讨论和谈判。

我们的工人所表现的态度也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对别人的依靠，他们经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需要一再给予指示，即使是处理非常普通的问题。他们只能领会非常简单的指示。复杂的工作必须尽可能分为最简单的步骤，每个步骤又须要再给予指示。

为了发挥该领土雄厚的潜能，采取迅速的措施对它的人民灌输自力更生的观念和责任感是很有必要的。惟有如此始足以弥补许多世代以来蓄意的殖民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在从前，当局认为“一点儿知识是危险的事情”，而且助长依靠和无知乃是殖民压迫的工具。即使东帝汶革命阵线也曾两度把我们召到他们分区总部，请我们提供协助或者意见。

最重要是掌握住以下的一点：这些人民的广大多数实际上不能够有效地应付新的情势或者了解任何向他们抽象地提出的问题。他们只习惯于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象“民主”一类的词儿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词儿同他们普通所关心的事物和普通活动联系不起来。

该领土各部分之间交通上的困难更加强了帝汶与世隔绝的保守性。即使在有公路的地方，每年两次雨季的六个月期间内，公路经常不能通行。从我们杜杜阿拉的家到区域中心只不过三十公里，但即使在最好的天气，也需要五个小时始能抵达。这些情况造成居民之间的分裂，强烈的地方主义以及对陌生人和新观念的不信任成为帝汶人的共同特征。光是要改变物质条件便需要许多年的努力，心理方面的条件不用说了。

我们在东帝汶居住的最后七个月里，有许多机会对东帝汶革命阵线成员的行动作直接的观察。除了我们亲自目击的那些行为外，在我们受到严密软禁的两个半月期间，每天都来见我们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官员时常夸耀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他们这样做，至少部分原因是想恫吓我们，试图得到我们的合作。我应当补充说，我无论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志愿参军的期间，或者是在毛毛族叛乱时被派驻肯尼亚期间，都从未目睹过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犯下这样的残暴、野蛮或不人道的行为。东帝汶革命阵线不断以逮捕、监禁和斩头处决相威胁，迫使人们就范。那些拒绝向东帝汶革命阵线同志敬礼的人都被关在当地一所旅馆内，不许使用厕所和床铺，一次好几个月只给玉蜀黍和水吃。我们的两名雇员卡洛斯和阿莱希奥·达丰塞尔——代理酋长同父异母的兄弟——便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囚禁了两个月。其他一些犯法情形比较严重者都被带到洛斯·帕罗斯，该地的区域中央委员会有权判处比较严重的刑罚，包括即时处决。关于这些处决的报告是由住在杜杜阿拉的受害人的亲属和在来访时向我们夸口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官员给我们提供的。象收听不是东帝汶解放阵线帝力电台所播送的无线电节目这类的事便是严重得可以处决的罪行。

我妻子和我被东帝汶革命阵线传唤的亲身经验也可以说明他们的方法。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我们被一名武装警卫传唤到洛斯·帕罗斯，会见该区域的政治和军事单位的联合委员会。整个守备部队，那时总数超过一千人排列在我们面前，他们并试图争取我们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为了诱使我参加他们的事业，他们答应免费送给我所要的领土内一切额外的土地，经费援助，独立东帝汶政府组织内一个显要职位以及其他奢侈的礼物。我们的答复是，作为拥有正式葡萄牙居留权的澳大利亚公民，我们必须保持中立，我们并不承认当时互相争权的三个党派——东帝汶革命阵线、帝汶民盟、帝汶民协——中任一组织的权威。

这次在洛斯·帕罗斯的期间，我看到了一箱箱打开了的小型武器和弹药，在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们曾经见到在我们登陆的小海湾内这些箱子正从一个渔船上卸下来。我们被救出后在巴考发现：用来制造这些箱子的木材和用来作标记的刻印与东帝汶革命阵线买给该镇内一位名叫方宏发的商人的澳大利亚医药援助品所用的箱子是一模一样的。

过了一个星期，“军队最高指挥”罗热里奥·洛巴托表示愿意在洛斯·帕罗斯同我面谈。我谢绝同他会面，理由是我以前说过的严守中立。

不过，当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势力开始衰减时，他们所用的方法便愈加严酷。十二月十日，即在我们被严密软禁后三天，我因心脏病发作躺在床上，我们再次被全副武装的部队押送到洛斯·帕罗斯。这是对印尼志愿军在巴考登陆的一项反应。杜杜阿拉的村民围住车辆动哭，诉说当地的东帝汶革命阵线代表正式告诉他们此刻正要把我的妻子和我押到洛斯·帕罗斯“斩首”。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的维克扼司令官对大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在滂沱大雨中，我们身上也没有雨衣什么的坐在敞蓬货车内被送到洛斯·帕罗斯中央委员会去。有些出席人士我是不认得的，但我听到他们以我熟悉的基斯瓦希利语和西班牙语互相交谈。他们坚持要我们向他们提供策略方面的意见，因为

他们的首长抛弃了他们，在上个星期离国潜逃，没有留下任何技术性的指示、医药用品或其他急需品。尽管他们又是威胁报复、辱骂和试图恫吓，我还是拒绝合作，告诉他们仿效我自十二月七日起那样地去挂起一面白旗，或者“挂起血腥的锤子和镰刀旗”。

“区域主管”阿尔丰索·萨维奥最近在各村落召开的几次群众集会上以及在星期日市集上三番五次地作出以下的威胁：当印尼志愿军进逼洛斯·帕罗斯时，他将把手榴弹丢进监牢内，把被囚的所有犯人炸死。这些犯人包括了其他党派的成员以及对东帝汶革命阵线及其纲领不表同情，保持中立或者表示反对的其他人，他们被囚在洛斯·帕罗斯监牢内，这监牢是军营的一部分。据我们所知，被囚的人超过了六百名。这数字是村民统计出来的，他们把被东帝汶革命阵线囚禁的父兄子弟和其他亲属的名子交给我们，力促我们协助改善他们的伙食和从红十字会处为他们领来一些医药用品。其中有一个妇人曾经从巴考走五十哩路到帝力去，为她的婴孩讨点牛奶，但他们告诉这些人说所有急需品首先是留给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官员用的，其次是他们的部队和支持者，至于其他人，无论他们多么需要，是半点也得不到的。

由于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威胁激怒了我，同时预期即将被处决，我坚持同这些犯人共生死，与其他面临死亡的犯人们关在一起，并指出东帝汶革命阵线这样对待我们中立人士是违反国际法的。由于澳大利亚对在帝力被攻一个星期前抛弃了他们的首长给予庇护，如果他们伤害了澳大利亚国民，它是一定会对他们施加报复的。

委员会听后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好几小时的讨论后，决定把我们送回杜杜阿拉继续严密软禁。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中断了一切食水和食物供应，并禁止任何人前来探访，违者斩首。

我们以前曾经听说过当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其他地区的处境日益不安定时，他们便开始劫持平民作人质，试图保证它自己的安全，二月三日，洛斯·帕罗斯为志愿军所攻陷，这一天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强迫杜杜阿拉的全体居民——男女和孩童一共

约三千人——向山区和远处的高原转移。我们不顾就地处决的威胁，拒绝同行，在急忙混乱中，他们惊惶撤退，饶了我们的性命，但任意毁坏村内所有平民的财产。目前，这些人质仍有大部分留在森林里，此时正当雨季，既缺乏食物、衣服，又缺乏医药用品或房舍，未死者现在的境况一定十二分的危急。

这类行为，特别是屠杀和劫持人质的行为，引起了人民极大的反对和仇恨。这些在东帝汶革命阵线统治下受苦的人们，要是由他们自己去，他们必然会对他们所遭受过的损害，进行报仇。倘使没有外力来恢复法律和秩序，由此而产生的互相仇杀真的会继续几个世代。无疑地，如果印尼在这个时刻撤退，由于人们要为被谋杀了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属们报仇，一定会爆发惨酷的战斗。

帝汶人自己曾表示极害怕印尼人会象葡萄牙人一般抛弃他们。他们知道一旦被抛弃的话，国内将会重新出现大动乱，到时候他们将遭受比过去更大的痛苦。在我们被解救后正要离开天主教会的当儿，人们围住我们哭泣，要我们保证将来再回去。现在，他们的遭遇使他们的志气受尽打击、他们惶惑了，心身和精神都崩溃了。

澳大利亚电台对帝汶局势的不负责和不符合事实的报道，使人们的志气更其消沉。这些根据东帝汶革命阵线向澳大利亚电台供给的假情报而作的报道是歪曲事实的，以致区域内的人们都改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德国电台转播的安塔拉通讯社和路透社虽然稍迟但是准确的报道。虽然我们对印尼救出了我们，并且不曾造成任何伤亡，一直很感激，但我们强烈认为，印尼应采取步骤反驳这些不实的宣传，从而避免人们遭受这许多不必要的苦难和沮丧，因为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鼓励，并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便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担心我们的离开意味着新抵达的部队所提供的保护将会结束，同时他们也会被东帝汶革命阵线劫持到山区去当人质。

他们对印尼的士兵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的，因为后者使他们免落在东帝汶革命阵线手里进一步受凌辱、掠劫和杀害。他们并不把印尼人当作外国人，这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因为多年来帝汶的两个部分之间一直相互交流。一九六七年，葡萄牙人实际上放弃了两个部分间的边防哨所，这很快地便导致东西两方交通自由通行，而印尼人对此并不加以阻挠。东西帝汶的家庭间甚至还通婚，这加强了在未成为殖民地之前便一直存在着的同一血统和文化的重要联结。

我在东帝汶的整段期间内，从没有看到或听说过志愿军曾对帝汶人犯下什么暴行或违法乱纪的行为。实际上，至少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印尼志愿军司令的难能可贵的自制精神。那是当我们正要离开杜杜阿拉，有些被驱入山区的人质试图加入我们。当他们下山的时候，当地东帝汶革命阵线代表团的主席骑马从森林中飞奔出来（由于他以前曾探访过我们，所以我们对他很熟悉），在妇孺面前抢舞他的短枪，迫使他们回到森林中去。尽管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官员就在眼前，解围部队的司令官着令他的部队不要开火，以免伤害无辜的平民们。

从杜杜阿拉的软禁释放出来以后，由于我在医生的陪同下乘小型飞机或直升机旅行，我有机会观察到东帝汶约百分之八十的领土的情况，并与领土内我所认识的人交谈。我只能说印尼红十字会和前来提供粮食、医疗、学校及其他极为需要的社会服务的经过训练的人员值得我的高度赞扬。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皇家工程队的退伍军人，我有资格声明并没有任何大规模轰炸或任何形式的化学战或生物战——尽管我们在帝汶的期间唯一可以收听到的新闻媒介澳大利亚电台有完全不同的报导。相反的，在复兴被几个月的内战所毁损的东帝汶社会方面以及在建立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方面均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印尼所运来的现代化设备，以及在这个革命嫌太小，战争不够大的国家内，各种年龄和各个阶层的居民——从在上学途中的学童至他们的祖父母们——所显露的欢欣之情，确使我们印象深刻。

在结束我的声明之前，我认为必须表扬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维托里奥·温斯拜阿富·圭恰迪先生和他的人员，因为他们在试图履行任务时，特别是多次努力同我们地区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接确时，表现出卓越的勇气和主动精神。他

的典范还驱使我本着联合国宪章揭示的人道原则的精神，对国际社会道出关于帝汶人民的困境的事实，希望可以导致他们不必要的痛苦的迅速结束。

在宣读我的宣誓声明之后，我愿意借此机会最强调地重申：在我们居住在杜杜阿拉的期间或者在被迫前往洛斯·帕罗斯的期间，我的妻子——一位受过国际卫生训练的专业人员——和我都不曾见过任何使用化学或生物战争方法的迹象。由于澳大利亚电台广播报道说，在洛斯·帕罗斯和杜杜阿拉，这类不人道的武器被广泛使用，违犯了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所以我们便注意起这个问题来。这些广播引起东帝汶革命阵线地方民兵和区域中央委员会的惶惑，以及居民广泛的惊恐、沮丧和凄惨的痛苦。

主席先生，如得你允许，为了进一步澄清该地的情况，我愿意宣读我的妻子所拟的一个关于我们离开该领土时——这又是还不到六个星期以前的事——东帝汶医务情况的短报告。

“关于东帝汶医务状况的报告：

“我是一个拥有三种证明书的护士，曾在世界许多国家内有过工作经验。过去三年，我居住在洛斯·帕罗斯区杜杜阿拉，在此之前我曾经到过东帝汶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有机会深入观察当地人民的普遍医务和卫生情况。我认为帝汶所有的设备确实比不上我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二十年前在中非的不发达地区所见过的设备。基于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资格就目前在东帝汶提供的医疗服务提出公正的看法。

“首先你必须体会到当地居民的确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他们的学习速度缓慢，并且对于新的事物非常疑心。印尼红十字会于短暂的时间内在消除他们的恐惧方面，补救他们几个世纪以来违反人道地缺乏的卫生设施方面和奠定一个现代医疗系统的基础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进展。

“在城市和乡镇中心，各医院已重新修整，治疗赶得上任何英国或澳大利亚医院的水平。医院内有普通医生、专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并且拥有新型的X光和化

验设备——还有相当于所谓飞行医生的服务，于必要时在森林地区用直升飞机接载病人。所有这一切对印尼志愿军和当地居民都一律是免费提供的。

“我们所见过的印尼红十字会成员最使我印象深刻——人人技术高明并且忠于职守。他们已在学校内教授基本卫生和急救常识，并为学童供应牛奶。他们随时接受各种年龄的自愿工人同他们一起工作——并经常予以指导和监督。这样做是希望因此获得的知识最后可以传入农村，以便日后改善健康和卫生状况。帝汶首次发动了男女童子军运动，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农村的水平。

“各红十字会诊所实际上提供了完备的医疗服务，它们组织得十分出色——向所有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治疗、药品、维生素等。工作人员还耐心地腾出时间向每个病人灌输关于清洁、饮食等基本常识，必要时供应肥皂、牛奶、食物或衣服。请相信我，我真的形容不出肥皂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好久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用柠檬或灰烬来洗澡、洗衣服和洗碗呢。

“现在所有的医疗设备已远超过在葡萄牙统治下这许多年间所得到的——当时六十五万人口，只有两名私人医生和一名牙医。印尼人‘——在六个星期以前’已经有二十五名医生，两名牙医和一千名以上的医务辅助人员，而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增添增加之中。

“在提供这种服务方面有谁能够比印尼人做得更出色呢？就种族来说，他们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是帝汶人的骨肉兄弟，并且过去先受葡萄牙统治，后受荷兰统治，他们本国曾有过克服类似问题的经验。

“他们各部门和各等级的工作人员在其他灾害地区，包括孟加拉国的水灾，都有过外勤服务经验。

“印尼组织是独一无二的，它无疑比英国、澳大利亚或甚至国际红十字会组织都要优秀，因为他们确实了解问题的核心，并且努力不懈地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忠于职守，有耐性，热情，在治疗各方面的病人时完全公正。

“最后，我愿意提出印尼红十字会所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由印尼人民自愿捐输的。

珍妮·西德尔（签名）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已同意，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以便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